

陕西师范大学·名古屋大学国际学术会议



# 中日文化交流的 历史记忆及其展望

ZHONGRIWENHUAJIAOLIUDELISHIJIYIQIZHANWANG

侯甬坚 江村治树 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名古屋大学国际学术会议



# 中日文化交流的 历史记忆及其展望

ZHONGRIWENHUAJIAOLIUDELISHIJYIJIQIZHANWANG

侯甬坚 江村治树 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ZH8N07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及其展望 / 侯甬坚，  
江村治树（日）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7-5613-4537-5

I. 中… II. ①侯…②江… III. 中日关系—文化交流—  
研究 IV. G125 G1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8314号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及其展望

侯甬坚 江村治树 编

---

|      |   |
|------|---|
| 责任编辑 | 王向辉   |
| 责任校对 | 高皓彤   |
| 封面设计 | 绿船设计  |
|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社 址  |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snupg.com">http://www.snupg.com</a> |
| 印 刷  |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mm x 1092mm 1/16                                     |
| 印 张  | 25.25   |
| 插 页  | 3   |
| 字 数  | 340千  |
| 版 次  | 2008年10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50.00元  |

---

## 编辑缘起

陕西师范大学座落于古城西安之南，其南墙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历史标志，即唐天坛遗址（圜丘状，1999年发掘）。学校西面有一个明德门地名，有明德门遗址。明德门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南墙上的一处大门（正南门），向北正对着皇城南墙上的朱雀门。按照明德门遗址所在的位置，向东直去，是穿过陕师大校园的。而明德门东面的启夏门位置，就在陕师大校园南侧。在陕师大校园东北方向，仅二三里之遥，就是闻名于世的大雁塔所在。这样看来，循着清代文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今人李健超教授《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著作的提示，我们确定了陕师大在唐长安城空间里的大致位置和范围。

从陕师大1944年建校起，校内的文科专业就很有特色。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最著名的人物是历史系（今历史文化学院）的胡锡年教授（1913.5~1996.9）。

再从陕师大档案馆所藏资料获知，胡锡年先生又名雪岩，乃浙江省海盐县通元镇人氏。他早年入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1938年在西南联大（清华10级）毕业。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先生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外交史及政治经济学。1950年回国工作，1953年调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曾任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等职。

胡锡年先生学贯中西，通晓多种文字。在清华读书期间，就翻译了

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著作《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世界书局 1943 年出版),抗战期间又译述了日本史学家栗田元次的著作《日本近代史》(正中书局 1947 年出版)。50 年代初,胡先生翻译了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著的《对华回忆录》一书(商务印书馆 1959 年出版),此书作为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原始资料,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进入 60 年代,胡先生的研究重点遂转入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在十年动乱的磨难中,胡先生坚持翻译了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巨著《日中文化交流史》,1980 年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译著。由于这部译著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至今仍然受到学术界的一致推崇。与此同时,胡先生还陆续发表了《隋唐时代中日关系中的二三事》、《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中国研究日本史的现状》、《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相互了解程度的比较》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为加强学术交流,胡先生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汪向荣研究员来校做学术报告,当时在校求学的历史系七七级、七八级不少学生在听讲中获益良多。随后几年,胡先生自己也曾前往日本讲学。

记得是在 1979 年秋季,胡锡年先生作为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的教授,开始招收培养世界近现代史专业中日关系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他先后招收过戴铁拴(戴禾)、石晓军、张英莉三人,他(她)们求学期间先后发表过《唐代来长安日本人的生活、活动和学习》、《中日史籍中的日使来唐事异同考》、《唐日白江之战的兵力及几个地名考》等论文,后来都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就职了。尤其是石晓军同学,在姬路独协大学任职后,一直活跃在日本的唐代史研究领域。

时间转到 1994 年 4 月,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尚永亮副教授在接受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United Board)的海外资助后,前往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访问研究了 1 年。同年 10 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侯甬坚副教授经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龙谷大学谷川道雄教授的推荐,亦前往名大文学部的东洋史学研究室访问研究,当时东洋史学研究室的负责人是中国明清史研究专家森正夫教授,负责具体接待来访学者的是同研究室的秦汉史专家江村治树副教授。

1995年内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述及。即1992年6月成立于西安的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有相当一批陕师大教师积极参与其中,并组织过许多活跃的学术活动,研究会本身就挂靠在陕师大中文系(今文学院)。日本方面的名大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对名著《史记》和司马迁的精神世界也是素有研究,恰当尚永亮博士代表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发出邀请时,时任名大文学部学部长的今鹰真教授(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便同意组团参加当年8月在陕师大举行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暨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的场面热烈而隆重,会后又很快出版了由徐兴海(陕师大历史系教授、研究会秘书长)、今鹰真、尚永亮合作主编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部论集的编辑单位即为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会,其中收录了日本学者今鹰真论文2篇、樱井龙彦、渡边幸彦、杉山宽行、大田加代子论文各1篇。

历史系侯甬坚副教授在名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的访问研究,到1996年11月便结束了。归国后,他同研究室的江村治树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2002年8月,江村治树教授和三重大学东汉史研究专家东晋次教授,借在西安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机会,再次访问了西安。此时,已调入西北环发中心的侯甬坚教授及李令福博士,协助他们对西安周围的秦汉都城遗迹进行了调查,最远到达了陕西淳化县境内的甘泉宫遗址。

时间推进到2006年6月,应日韩多所大学的邀请,以陕师大副校长张建祥为团长、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张建成、国际汉学院院长陈学超、教务处处长党怀兴、西北环发中心主任侯甬坚为成员的五人代表团,在两周内对日韩9所大学和2个语言培训机构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名古屋大学及其文学部访问期间,由张建祥副校长提议,与文学部达成了共同举办国际会议的意向。同年11月,名大文学部学部长町田健教授和江村治树、高桥亨教授回访了陕西师范大学,议定了来年国际会议的会题、规模及召开形式。随后,侯甬坚、李令福二人又协助江村治树先生对西安周边的都城遗迹展开了调查。

按照陕师大网站“校内新闻”栏目提供的信息,为开拓新的交流领域,落实上一年交流协定中的具体内容,以校长房喻为团长、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张建成、科学技术处处长刘昭铁、社会科学处处长张正军、音乐学院院长田大成为成员的五人代表团,于2007年10月又对日韩8所大学和2个教育机构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在名大访问期间,代表团连夜发回来的信息,就是提请校内积极组织和落实将于11月下旬在陕师大举办的两校国际会议。

2007年11月22日14时50分,名大文学研究科副科长神塚淑子教授同江村治树教授率领的11人代表团抵达西安,23至24日两天,“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及其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师大如期举行。会上,大多数论文作者做了大会报告,台下台上的提问和应答此起彼伏,相互之间交流了许多颇感兴趣的学术问题。会议前后,校内社会科学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日语系、新闻中心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会议的预先安排,会后应编辑出版会议文集,具体由侯甬坚、江村治树二人负责收集和编辑,所有文稿皆为切题、通顺的中文论文,欢迎有部分图片插入。整个文集中,收录名古屋大学作者论文9篇,陕西师范大学作者论文16篇,总共25篇。

为附丽会议主题,爰述有关往事于前,多种记忆交相汇映,希冀可看作是书中各位学者内心创造的一种自然延展……

编者

2008年4月28日



## 目 录

### 【哲学·宗教学】

- 空海的文字观及其与六朝宗教思想的关系 神塚淑子(3)  
讲学生涯与社会教化使命  
——对王阳明平生志业重心问题的考察 林乐昌(21)  
“仁学”及其当代开展何以可能 刘学智(36)  
善导之净土教教化的两个方向 近藤法雄(48)

### 【文学·艺术学】

- 《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张新科(65)  
泷川资言《史记汇注考证》综论 党怀兴 王娅维(92)  
《源氏物语》的诞生与后宫女性 高桥亨(106)  
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国际交流  
——以遣唐使为中心 大井田晴彦(112)  
开拓中国文学新时代的青木正儿及其与胡适的交流  
——二人往来的书简及名古屋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  
“青木文库” 加藤国安(119)  
日本佛教禅宗绘画与浮世绘中的歌舞伎形象论  
李 强 (黎羌)(144)  
“物之哀”与日本民族的审美心理 吴舜立(169)

- 日本和歌俳句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小诗 王 佩(181)  
《红楼梦》章回目录的衔接及其翻译 张霄军(192)

## 【历史学·考古学】

- 中国方孔圜钱(秦半两)的出现与日本的青铜货币 江村治树(203)  
高句丽遗民高性文、高慈父子墓志关联问题考释 拜根兴(215)  
从出土文字资料看 8、9 世纪的日中交流 古尾谷知浩(233)  
唐宋王朝和周边国家——古代东亚的“Strange Parallels”  
林谦一郎(247)  
五代十国时期的陆路交通路线 杜文玉(256)  
北洋新政与日本  
——北洋新政日本模式探微 张华腾(277)  
清末民初来陕日人活动的初步研究 史红帅(301)  
日中交流考古学  
——以古代瓦为对象 梶原义实(322)  
唐长安含光门遗址及其价值和保护 卜 琳(332)

## 【政治学·社会学】

- 法德关系与中日关系：一个比较视角的分析 张建成(349)  
一方水土如何养一方人？  
——以渭河流域人民生计为例的尝试 侯甬坚(361)  
浅谈日本人配偶者之间的称呼 张 灵(384)



【哲学·宗教学】



# 空海的文字观及其 与六朝宗教思想的关系

神塚淑子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研究室)

空海在《声字实相义》的开篇曾指出：“文字所在，夫如来说法，必藉文字。六尘其体。”在《御请来目录》中又说：“法本无言，非言不显。真如绝色，待色乃悟。”意思是说，语言、文字是可以表现、传达出宇宙本源性的真理的，从而表明了真言密教在语言、文字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空海的密教思想体系，正是以这种语言、文字观为重要基轴而构成的。

关于空海的言语哲学所具有的重要性，已经有不少学者有所阐述，并且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研究。<sup>①</sup> 本文拟从见于《文镜秘府论》天卷总序的“自然之文”这句话着手，将其与中国六朝时代的佛教、道教思想的关系作为焦点，较为深入地作一番考察。我想把考察的范围限定于空海言语哲学中的文字观方面，但在考察其文字观时，并不准备拘泥于密教思想的框架之内，而是从影响空海的文字观形成的背景思想、即从六朝宗教思想的角度来观察空海。由上述视点出发所进行的考察，必然要

---

<sup>①</sup> 参看宫坂宥胜的《空海的言语哲学》(《エピステーメー》1976年7月号)，后收入《密教思想的真理》(人文书院，1979年)一书，北条贤三的《空海的言语理论》(《理想》1982年11月)、《关于〈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丰山教学大会纪要》一二，1984年)。

考证与空海的言语哲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但本文的目的并非仅限于考证,我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入空海的语言哲学中,从而触及其最本质的特征。

## 一、“自然之文”

《文镜秘府论》六卷是空海编纂的有关中国六朝隋唐时代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中保存了很多中国现已亡佚的书籍资料,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虽然从总体上说,空海只是《文镜秘府论》的编者,但天卷总序及东西两卷的序则由其执笔写成。<sup>①</sup>

空海在天卷总序的开头开宗明义,表明了自己的文字观:

夫大仙利物,名教为基,君子济时,文章是本也。故能空中尘中,开本有之字,龟上龙上,演自然之文。至如观时变于三曜,察化成于九州,金玉笙簧,烂其文而抚黔首,郁乎焕乎,灿其章以馭苍生。然则一为名始,文则教源。以名教为宗,则文章为纪纲之要也。世间出世,谁能遗此乎?

在这段话里,空海认为由圣人施行的教化、济世,无论佛教还是儒教,皆具有美的形(文、章),并且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同时他还认为,这些具有美形的示教语言,并非人为创造,而完全是天造地设的“本有之字”、“自然之文”。“本有”似乎是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词汇,但这里只是原本存在的意思,可视作“自然”的同义语。

空海此后又从“文章”植根于天地自然而具有重大意义的立场出发,对人工刻意经营的文章即文学创作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展开了论述。这些论述与六朝时代那本文学理论大著《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思

<sup>①</sup> 参看《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五卷(筑摩书房,1986年)所附兴膳宏的《解说》。

想内容方面的共通之处,当然是很引人注目的。<sup>①</sup> 不过,本文更关心的,是“本有之字”、“自然之文”所体现的思想,即圣人教化万民、救济众生的语言(文字)乃是生成于天地宇宙间的自然之物这一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怎样产生的问题。那么,空海的上述语言、文字观,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呢?下面本文就把它作为重点进行考察。

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总序提出的“本有之字”、“自然之文”的观点,正如诸家所注明的<sup>②</sup>,直接来源于《大毗卢遮那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所谓《大日经》)与河图洛书的思想。

唐代善无畏、一行汉译的《大毗卢遮那经》,作为密教的根本经典而为人所知。其卷二《入曼荼罗具缘真言品》云:“此真言相,非一切诸佛所作”(大正藏一八,一〇上),意思是说真言并非由何人所作,跟如来出现与否亦无关涉,而只是原本存在之物。受其启发,空海在《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中亦云:“若依《大毗卢遮那经》所云,此是文字者,自然道理之所作也。非如来所作,亦非梵王诸天之所作。……诸佛如来,以佛眼观此法然之文字,即如实而说之利益众生。”

不难发现,空海此言与《文镜秘府论》“本有之字”、“自然之文”的观点一致,由“自然道理”生成的文字或谓“法然之文字”所表明的意思,也与“本有之字”、“自然之文”的观点相同;说诸佛如来用这样的文字以利众生,亦与《文镜秘府论》所说的圣人教化、济世的方法并无二致。上举空海“若依《大毗卢遮那经》所云”以下的文字,不见于《大毗卢遮那经》,应是空海对经文要点的概括。不管怎么说,有关圣人用以教化、救济众生、记述真理的文字是自然界中自然生成的观点,是空海汲取《大毗卢遮那经》思想营养的结果,对此应该不存疑问。

<sup>①</sup> 参看兴膳宏《〈文镜秘府论〉里的〈文心雕龙〉》(《古田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1985年),后收入《中国的文学理论》(筑摩书房,1988年)一书。

<sup>②</sup> 参看福永光司《文镜秘府论序译注》(《日本的名著·三(最澄、空海)》,中央公论社,1977年),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五卷(筑摩书房,1986年)。

“本有之字”、“自然之文”这一观点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河图洛书的思想。所谓河图洛书，是指黄河里出现的龙马与洛水中出现的神龟背负着的显示有文样的图、书。龙马与神龟从河洛中显身之事，被认为是圣人将出的祥瑞。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虽然在《论语》、《礼记》等众多文献中有一些零散的记载，而《易·系辞传上》则对天与圣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河图洛书在其中所占的位置有清晰的表述。其文云：“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几句话明确告诉我们，天地间生出神秘的事物、形象，是天为表现自己的意志而提示给人间世界的，圣人就是能够明察上天所降事、象之意义、领会上天之意志、并且顺应天意行动的人。河图洛书即为上天所降的事物之一。

上天向人间世界显示自己意志的东西，有多种多样，比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更替，或表现为凤凰、朱草、嘉禾、甘露等种种祥瑞的出现。其中，河图洛书的特征在于它们是具有图式性质、象征性质的文样形式。此后，河图与八卦的结合，洛书与洪范的结合（见于孔安国为《尚书》的《顾命篇》、《洪范篇》所作的传等），也都是出于表达天意的目的。

本文开头所举的《文镜秘府论》天卷总序有“龟上龙上，演自然之文”之语，将河洛的龙马、神龟背甲上的图书与“自然之文”结合成一句。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河图洛书的思想是空海“自然之文”观点的另一个思想来源。顺带说一句，天卷总序紧接“龟上龙上，演自然之文”之后，又有“观时变于三曜，察化成于九州”之句，此亦是由《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句转化而来。所以，空海对天与圣人的关系的认识——即圣人明察上天显示给人间世界的事物、形象后，顺应天意教化人们这一观点，受到了《易》的思想的极大影响，对此我们也不能忽视。

综上所述，空海《文镜秘府论》天卷总序的“本有之字”“自然之文”的观点，其思想来源有二，一是根据汉译佛经《大毗卢遮那经》的思想，另一个来源是代表中国传统观念的河图洛书的思想。“本有之字”“自

然之文”主要指的是：圣人用真理教化救济众人，其传达真理所用的语言（文字），并非人力创造，而是自然天成，是自然界本身的产物。与之相似的意见在《文镜秘府论》的其他章节里也可以见到，比如《南卷·论文意》的开头有以“或曰”引出的一段文字：“教而天下自然。此谓皇道。道合气性，性合天理。於是万物禀焉，苍生理焉。尧行夫文字起於皇道，古人画一之后方有也。先君传之，不言而天下自理，不之，舜则之，淳朴之教，人不知有君也。后人知识渐下，圣人知之。所以画八卦，垂浅教，令后人依焉。”一般认为此段文字引自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但其主要内容与空海的天卷总序基本重合。其大意是说，在太古之世，“皇道”（大道）得以实现，人人不待教化而自具纯朴之德，社会不用治理而自然成为治世。把这个“皇道”形象化的符号就是“一”。后来世人道德渐衰，圣人就以“一”为基础画八卦，垂教世人。在中国的传统思维里，把八卦作为文字的起源，所以“皇道”也就成为文字的最初本源。又因为这个“皇道”，指的就是天地自然之道，所以这段文字与“本有之字”“自然之文”的观点也就相通了。

不过，我们还必须指出，作为“本有之字”“自然之文”观点的思想来源，《大毗卢遮那经》与河图洛书的思想这二者虽然在文字的自然起源说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但二者所设定的文字形体却是迥然有别的。《大毗卢遮那经》设定的文字是印度文字（梵字），河图洛书尽管最初显形于龙龟背上的文样完全是图式性质、象征性质的东西，但最终经由解读它们的圣人之手，被中国文字（汉字）所更换了。也就是说，梵字与汉字本来是分别由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派生的不同的文字体系，但在这里却被置于同一个层次上论述。因此我们在思考空海有关文字认识的问题时，就不能不把梵字汉字综合成一个文字问题来看待了。

关于此点，读一下空海所写的《献梵字并杂文表》（《性灵集》卷四）就更清楚了。弘仁五年（814）闰七月廿八日，空海向嵯峨天皇献上了包括《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一卷、《古今篆隶文体》一卷、王右军（王羲之）《兰亭碑》一卷、梁武帝《草书评》一卷在内的十卷书，空海献书时同时奉

上了《献梵字并杂文表》这篇文章。该文在论述文字的起源与意义时写道：

空海闻，帝道感天则秘录必显，皇风动地则灵文聿兴。故能龙卦龟文待黄牺以标用，凤书虎字候白姬以呈体。於焉结绳废而三坟（指伏羲、神农、黄帝之作）灿烂，刻木寝以五典（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之作）郁兴。明皇因之而弘风扬化，苍生仰之而知往察来。不出户庭，万里对目，不因圣智，三才穷数。稽古温故，自我垂范，非书而何矣？况复悉昙之妙章，梵书之字母，体凝先佛，理含种智，字络生终，用断群迷。所以三世觉满尊而为师，十方萨埵重逾身命。满界之宝，半偈难报，累劫之障，一念易断。文字之义用，大哉远哉！

请恕我引文稍长了一些。此文与《文镜秘府论》天卷总序相同，将汉字与梵字（悉昙）并举，并分别论述了二者的起源与意义。对于汉字，论述了上天因感应天子的圣德而降下（从人的角度观之，当然属“自然”出现）河图洛书之事。对于梵字，指出了佛出世之前早已有之（因而并非何人所作，而是在无限久远的往昔原本存在）。二者皆与《文镜秘府论》天卷总序“本有之字”“自然之文”的观点一致。在这里，空海试图阐明的最重要的思想是：无论汉字还是梵字，本来皆从宇宙自然的神妙运营中得来，宇宙的真理即密藏于文字之内，圣人用这些秘藏着真理的文字教导人们；而人们从这些文字入手也能够追求到真理。很明显，这也是天卷总序所强调的。这种将文字与宇宙的真理紧密联系起来的思考方法，构成了空海的文字认识论的基础。必须看到，空海的文字认识论是将梵字与汉字置于同一个层次上进行考察才建立起来的。顺带补充几句，空海紧接着《献梵字并杂文表》上述引文后又说自己“窟观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震旦之书。每见苍史古篆，右军今隶，务光韭叶，杜氏草势，未尝不野心忘忧，山情含笑也”，从而表达了对“印度